



三峡蓄水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截至 28 日 20 时,三峡水库水位已达到 174.43 米,三峡水库 2019 年 175 米试验性蓄水进入最后冲刺阶段(10 月 28 日摄)。新华社发(郑家裕摄)

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
社
XINHUA NEWS



新华社客户端

2019 年 10 月 29 日

星期二 己亥年十月初二 今日 8 版 总第 09799 期

新华通讯社出版



扫描二维码
关注“新华每日电讯”



郑万铁路开通进入倒计时

10 月 28 日,首趟 G55543 次动车组列车从郑州东站发出,郑万铁路郑州局管段进入试验运行阶段,标志着线路开通进入倒计时。新华社记者李安摄

旨在为民
重在办事
成于务实
事办机制十五年见闻录

浙江建立健全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十五年见闻录

本报记者何玲玲、胡作华

国庆前夕,地处浙江一南一北的苍南县和德清县,在同一天各自举办了同样以展现农业农村农民新风貌为主题的节会活动。苍南“2019 中国农民丰收节”上洋溢的笑容,首届“美丽中国田园博览会”上分享的德清经验,无不在诉说近年来浙江农村的巨大变迁。

一边光鲜亮丽,一边“脏乱差”,这是本世纪初浙江部分城乡发展失衡的生动写照。如今,从“浙南屋脊”到浙北平原,从浙西钱江源头到东海之滨,到处河清海晏、鸟语花香,各项基本公共服务高度普及的协调共享模式彻底取代了农村的落后面貌。

这一显著的改变源于 15 年前,以 2003 年 7 月浙江省委提出的“八八战略”为指引,2004 年 10 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制定实施《关于建立健全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着手系统性地解决老百姓反映强烈的城乡发展差距和民生“短板”问题。

15 年来,浙江历届省委、省政府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成功地把为民办实事纳入了规范化、制度化、经常化轨道,交出了一份新时期共产党人执政为民的合格答卷。

为民办实事,旨在为民

在杭州市江干区丁兰街道会林路,每天上午 10 点、下午 4 点,都会有一辆绿色垃圾车准时出现在街头。听到熟悉的《荷塘月色》音乐响起,沿街商户们便取出自己分好类的垃圾,有序倒入车上的垃圾桶里。包括丁兰街道在内,江干区下辖 8 个街道、366 个生活小区到今年 7 月底已实现垃圾分类全覆盖。

“垃圾分类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江干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蔡建云说,目前江干已提前完成区“两会”承诺的 2019 年垃圾分类民生实事工作目标,“人人动手、家家行动”成了常态。

“为民办实事旨在为民,这是 15 年前省委推行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之初就明确的宗旨,要求为民办实事不能光凭工作热情,要保证办的事一定是群众最需要、最欢迎、最能得实惠的。”浙江省政府副秘书长陈广胜说。

2004 年 10 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在国内率先制定实施《关于建立健全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确定了就业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城乡住房、生态环境、扶贫开发、科教文化、权益保障、社会稳定十个重点工作领域。2005 年 1 月,浙江省“两会”把“突出抓好十个方面实事”纳入《政府工作报告》,各市县随即也作出相应部署。

作为当年省“两会”承诺的“切实做好困难学生就学资助工作”民生实事的兑现措施,2005 年 5 月,浙江省率先全面实施农村中小学“四项工程”。这是改变农村孩子命运的一项政策。”云和县梅源中学校长冯志龙说,以爱心营养餐工程为例,省财政先是对外每名贫困生补贴每周 5 元伙食费,后逐渐增加为每天 5 元。这所山区学校学生的身体素质明显提升,贫血率由本世纪初的 7.7% 下降为现在的 1.1%。

这些年来,浙江各级各部门建立了“民情日报”“民情地图”“民情通”等访民情听民意工作机制,完善了网络投票、社会公示、各方听证等工作程序,并于 2017 年起全面推广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表决制,不断推进民主决策,提高决策科学水平。温州市从今年起开展全市中小学生“明眸皓齿”工程,呵护青少年儿童的眼睛和牙齿,这项工程在年初市“两会”上被票决为 2019 年十大民生实事项目之首。

抓民生,也是抓改革、抓发展

今年 7 月,龙泉市岩樟乡绿坑村低保户周裕显的 4 箱蜜蜂迎来了第二个收获季,尽管雨量影响了收成,2500 元收入还是有的。这是当地利用省财政专项资金推出的民生实事项目——为低收入农户送蜜蜂并提供蜂蜜收购服务,2018 年,全市首批获赠蜜蜂的 448 户低收入农户增收多在 3000 元以上。

这项财政资金就是 2017 年浙江省财政厅推出的“两山”专项激励资金。龙泉市市长吴松平说,这两年,龙泉利用 3 亿元专项资金,撬动社会资本 25 亿元,进一步做强毛竹、茶、蘑菇、蜂等七大类增收产业,全市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居全省前列。

“浙江省委在推行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之初就明确要求,先要想办事,还要能办事、办成事,办成事就要创造良好的条件,包括要切实增加投入,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和转移支付的力度。”浙江省财政厅厅长徐宇宁说。

2006 年起,浙江在全国率先施行把 2/3 的新增财力用于民生事业的财政制度。接着,又按照建立服务型政府的要求,不断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完善公共财政制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2012 年,这个省改革专项性一般转移支付管理办法,进一步提高财政绩效。2017 年设立“两山”专项激励资金,进一步调动市县积极性。2018 年,着手构建集中财力办大事的财政体系。

(下转 3 版)

创新市域社会治理的“天津算式”

本报记者李鲲

秋日的午后,走进天津北辰区瑞益园社区,置身公园的感觉真真切切——牡丹园、月季园、听书园、党建园、民俗园、健身园、统战园……每个园区各具特色。还有“北辰百姓议事广场”,总有人在此讨论社区发展的事。

若不是听居民介绍,记者难以相信,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环境脏乱、违建林立的保障房社区。后来,当地党委下决心整治,基层政府投资,社区统筹管理,志愿者无偿服务,物业公司出钱装饰,共同成就了社区的今天。

瑞益园的华丽转身是天津社会治理优化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天津以加强党建为引领,以放权基层为重心,联动统筹各种力量,逐步探索出创新市域社会治理的“天津算式”。

“书记带头”下基层:党建凝聚社会治理向心力

16 日实地察看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筹备备等情况;17 日去辖区内多家养老机构调研;18 日到区属国有企业调研……这是 10 月中旬天津市和平区委书记陈绍旺的几项日程表。

“社区换届遇到问题,我去解决;街道卫生出了状况,我去解决;邻里出现纠纷,我还会去解决,社会治理没有小事,因为我是‘战区主官’,是第一责任人。”陈绍旺说,他的办公地点已经搬到了百姓身边。

在天津,“战区制、主官上、权下放”是早已深入人心的社会治理原则,全市被视作国家治理的一个“战区”,16 个区、248 个街镇、5205 个社区村层层划分为“分战区”,各“战区”党委

书记是该区域社会治理的第一责任人。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天津作为一个直辖市,既有城市也有乡村,社会治理层级‘战区’的划分,既有利于各级在全域范围内调配资源,也有效避免了责任主体不清、职责权限模糊的问题,而党委‘一把手’负总责的机制,则确保了党建引领这条纽带切实发挥作用。”天津市委政法委专职委员何德成说。

南开区万兴街道域内驻街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有 46 家,过去,很多单位级别高、难协调。现在,天津市构建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万兴街道工委与驻街单位形成了共建共治合力,挺起了街域治理的“主心骨”。

除了政府部门,党建也把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拧成一股绳。河西区解放南路商圈有 5 家大型卖场、12 家大型商业体,过去党组织不健全、市场同质竞争无序。2018 年,“商圈党委”成立,聚焦党建、经济、民生,深入开展 27 项服务,优化营商环境,也改变了商圈面貌。

目前,“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已被天津 83.7% 的业主委员会写入业主大会议事规则、被 71% 的物业公司写入公司章程。

放权减负重基层:改革激活治理一线生命力

在全国各地普遍重视环境绿化美化的当下,天津和平区新兴街道朝阳里社区的居民耿慧敏不曾想过,自己提出“拆除小区花坛”的建议能够很快得到落实。

原来,耿慧敏家的楼紧挨着一条河,每到

夏天,小区里的花坛虽然美丽,却也总会招来大批蚊蝇。今年夏天,新兴街道在了解到居民的这一诉求后,很快协调区城管委、绿化管理所进行实地调研,经过分析研判,最终把花坛拆掉了。

“街镇吹哨,部门报到。”天津在充分吸收其他地区经验的基础上,将街镇机构精简到“1 委 8 办 3 中心(站)”,赋予街道对有关部门的“吹哨”调度权、考核评价权、人事建议权,同时明确提出应该由部门落实的工作职责不得下派给街道社区,确保街道聚精会神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

和平区新兴街道党工委书记王颖表示,天津以机构改革为依托的“吹哨报到”,重新定义了基层政府或派出机构与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基层在获得赋权的同时,也甩掉了很多不必要的负担,真正得以轻装上阵,保证其在社会治理一线的生命力。

不仅如此,天津的很多街镇更进一步对社区村下放权力,激发基层自治组织的活力。

今年以来,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蓟州区下营镇党委决定将各村收取的宅基地有偿使用费全部返还给村,通过扩大财权增强了村集体兴办公共事业的能力,同时将宅基地安排和使用等重要事项的决策权全部下放到村,而各村对镇职能部门考核结果直接计入部门绩效,让村干部既有责任事,又有权管事,更有资格说事。

联动各方靠基层:社会统筹矛盾化解创造力

在天津滨海新区海滨街道华幸社区,38

岁的田寿权每天都会骑着自行车在社区周边转好几圈。几年前,作为一名“上访户”的他无所事事,现在,他是当地的一名“网格员”,巡逻是他的职责。用他自己的话说,“角色转变有点大,现在的工作很有意义,想明白很多事情。”

为改变各地普遍存在的“七网八网、各自为战”,天津将全市划分网格 1.9 万个,配备专兼职网格员 2.4 万余名,明确社区村党组织书记担任网格长,民警担任副网格长,整合熟悉基层情况的社会力量共同实现社会治理,将矛盾纠纷化解于萌芽之中。

北辰区井田公寓社区居委会主任张莲喜告诉记者,在重新划分的网格之下,他们还建设了邻里守望互助微信群,楼长担任群主,群成员就是每个楼门栋的家庭成员。“一天晚上社区突然停电,居民议论纷纷,通过邻里守望互助群,我们第一时间得到消息,马上联系电力公司了解情况,恢复电力,保障社区居民正常生活和情绪稳定。”张莲喜说。

在天津,从全国第一个社区志愿者组织发祥地和平区朝阳里,到现在“河西大姐”“北辰百姓”等志愿服务“品牌林立”,社会治理中的百姓自发力不断壮大。58 岁的“河西大姐”王富珍告诉记者,志愿者“熟人好办事”,可以有效成为政府部门和群众之间的润滑剂。

此外,天津还以开设议事厅、工作室等形式,统筹乡贤、退休政法干警等力量帮助排查和多元化解矛盾纠纷,也通过加装电子监控、APP 上传问题等科技手段,形成“群防群治”。

历史的伟大的决战创举

“世界屋脊”上的反贫困奇迹

新华全媒头条
阅读更多全媒体报道
请扫描二维码下载新华社客户端,订阅“新华全媒头条”栏目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新华社记者

西藏,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是我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也是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最为突出的地区之一。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西藏在 120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正在书写一个亘古未有的奇迹——贫困人口已从 2013 年底的 80 万减少到去年底的 15 万;贫困县区数量从 74 个减少到 19 个,摘帽总数居全国首位;贫困发生率从 30% 降至 5.6%。

作为中国反贫困斗争的重要战场,西藏今年的攻坚目标是实现 15 万剩余贫困人口脱贫和 19 个贫困县区摘帽,力争在雪域高原消除绝对贫困。

从封闭到开放:易地搬迁创穷根

山南市加查县冷达乡共康村是一个“村龄”不过 2 岁的村庄,这里的生活格外热闹。

共康村是山南市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点,占地面积 708 亩,总投资为 2.1 亿元,有 369 户、1269 人从雅鲁藏布江畔不同地方迁入。

58 岁的阿古赤列搬进新房后非常高兴:“以前老房子在半山坡上,又破又暗,每年冬天更是煎熬。现在家里水电齐全,宽敞明亮,出行也方便。”

为方便百姓的新生活,共康村还建有幼儿园、卫生院、垃圾中转站、牲畜棚圈等场所和设施,还有村委会统一出租管理的 28 套两层商业门面房,每年为村集体创收 60 多万元。共康村党支部书记查斯说:“共康的寓意是‘感谢共产党,同步奔小康’。”

村民曲珍 9 月初刚收完青稞,准备去县城打工。“我家以前在山沟里,耕地不多。现在全家不但住上新房,还分到了不少田地,青稞、油菜收成是过去的 2 倍还多。”

既要“搬得出”,还要“稳得住”。加查县在这里开发耕地 1679 亩,使人均耕地面积达到 1.3 亩。共康村去年成功试种青稞、蔬菜、西瓜等,创收 65.78 万元。村里还成立了集体企业,对全村 574 名青壮劳力进行技能培训并编入不同的工作互助组,做到了“人人有平台、人人有事做、人人有收入”。

特殊的地理环境是西藏很多地区致贫的主要原因之一。极高海拔、大雪封山、土地贫瘠……一些地方几乎与世隔绝,“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让广大群众在脱贫路上步履蹒跚。

▲ 山南市乃东区克松社区居民在开耕仪式上(3 月 16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李鑫摄

啃下易地扶贫搬迁的硬骨头,才有脱贫奔小康的好盼头。

位于藏北高原那曲市尼玛县的荣玛乡,平均海拔 5000 米以上,自然条件恶劣,脱贫难度大。去年 6 月,当地农牧民作为西藏首批搬迁离海拔地区的群众,跨越上千公里,从藏北高原南迁至拉萨,离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生命禁区”,住进了新家园,开启了新生活。

共康村、荣玛乡都只是西藏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创掉“穷根子”的缩影。

“十三五”期间,西藏计划对 26.6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记者从西藏自治区脱贫攻坚指挥部获悉,截至目前,西藏全区 975 个易地搬迁安置点(区)中,已竣工 910 个,搬迁入住 5.6 万户、24.8 万人,占计划搬迁人数的 93%。

从“输血”到“造血”:对口援藏结硕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拉萨有“北京路”,日喀则有“山东路”,林芝有“福建园”,阿里有“陕西路”……雪域高原上的一条条道路和一座座公园的名字,铭记着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也见证着对口援藏工作折射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1994 年,中央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援藏方针和“长期支援、自行轮换”的干部援助方式,自此开启了中央与全国兄弟省市长期对口支援西藏发展的历程。

仅在 2016 年至 2018 年,17 个对口援藏省

(市)及 16 家对口援藏央企就实施各类脱贫攻坚项目 1589 个,完成投资 93 亿元。

发展产业是扶贫治本之策,也是援藏的发展重点。近年来,西藏逐步培育发展出了青稞、牦牛、旅游、民族工艺品等特色优势产业,带动了大批农牧民增收致富,农牧区“造血”能力与日俱增。

一个多月前,那曲市色尼区罗马镇 660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一次性领到了嘎尔德扶贫畜牧产业示范基地发放的 52.8 万元分红款。这个示范基地占地面积 9990 亩,包括牲畜养殖区、乳制品加工区、人工草区等。

“公司在拉萨设有 5 个销售点,每天销售额 1.5 万元左右。夏季每天收购 2250 公斤牛奶,大多是从牧民散户中收购。”基地负责人明加塔说,52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在这里从事挤奶、质检、销售等工作,月工资最高达 4500 元。

“公司+农牧民经济合作组织+基地+牧户”的扶贫模式,带动了市场化牲畜养殖需求增加,潜移默化中促使群众陆续调整牲畜养殖结构。”色尼区区长赤来塔吉说,不仅提高了畜产品附加值,还增加了就业岗位。年底将按照纯利润的 70% 给参与群众分红,相信色尼区今年脱贫的目标能顺利实现。

数据显示,自 2016 年初至今,西藏全区累计开工建设产业扶贫项目 2567 个,其中完工 1701 个。截至 8 月底,全区已通过产业扶贫带动 22.2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如期实现脱贫。

旅游扶贫是破解“美丽贫困”的另一把钥匙。近年来,西藏精准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依托世界屋脊丰富的旅游资源,以产业融合发展带动千家万户增收致富,一大批昔日贫

困山村阔步走向小康。